

晚清上层社会结构变化的现代性解读

我国学术界对于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过于简约化。这里，本人试图通过对晚清上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剖析，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中国现代化的规律及其特征。

一、现代性的张力与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分层理论是现代社会学、政治学的重要论域。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社会的分层。金耀基将社会的分层性称之为“高度的结构分殊性”(highly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这也就是雷格斯 See F. W. Riggs 所说的“高度的绕射化”(highly diffracted)，“绕射的社会”接近于现代的社会。“现代化产生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应付不断变化的能力问题，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題即发展出一种制度结构的能力它能‘承受’不断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和要求。”^②社会结构的变化“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心变化和随之产生的问题。这是现代性的挑战，也是后传统社会秩序的挑战”^③。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材《西方政治学》认为，“多元社会有着不只一个文化和社会方面分离的大集团”。“多元社会的政治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 101～10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 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第 201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③ [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 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第 201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常常根据集团区分结构采取不同的路线”。多元社会的“等级制度可能比平行制度拥有更多的‘社会粘合力’和更多的规范理由。然而当粘合力失效时结果就是社会革命”。^①上述理论揭示了现代性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与社会革命的发生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活力之源，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不断扩张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即旧的社会结构不断“解组”（挪用金耀基语）新的社会结构不断“重组”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分层化是“现代”的一个“变项”。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信息化、技术化、职业化、世俗化的发展，必然出现社会分层化。中外现代化研究者对于现代社会的特征有多种不同的概括，其中，萨顿从社会结构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特征：在现代社会，以全体性、专门化和以成就决定地位的准则为主；高度的社会流动；发展完善的职业体制；以职业成就的一般化型式为基础的“平等的”阶级体制；具有特殊功能的、独立的结构，即“协会”的盛行。而在传统社会，则是以归属性、维护自身利益和泛能型式为主；稳定的地方群体和有限空间的流动；比较简单和稳定的“职业”分化，泛能作用的“低差异”的分层。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正如罗斯托所说：“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的工作，在基本上是政治领导者的责任”。^{②③}而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指非西方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原来处于边缘化半边缘化即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境地，其现代化是在与殖民主义相伴而入的现代性的张力驱动下开始的），政府的作用更具有关键性。在这些国家，“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本主

曾繁正等编译：《西方政治学》第248页，红旗出版社，1998。

〔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第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1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义因素十分薄弱,经济自组能力尚待培育^①。中国即是如此,费正清说,中国“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②。正因为如此,拥有稀缺资源的国家上层建筑能否受动于现代性而负起现代化的领导责任,就成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摆脱依附性地位、走出边缘化沼泽的关键性因素。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政权力量往往都比较弱,这主要是因为殖民主义对它们的侵略和控制,使得这些国家政府的职能无法正常发挥,现代性扩张缓慢,现代化轨迹九曲回肠。但是,决定这些国家政权强弱,除了殖民主义因素以外,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政府对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以及行为取向。西方学者曾经用“挑战—回应”理论来构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这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色彩。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对于西方的挑战具有消极性、被动性。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调适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之一。社会变化的绝对性,决定了调适的绝对性。统治者只有调适,才能长久统治。第二 在资本主义时代 由于现代性的广泛渗透性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的调适被赋予了现代性的意义,这些国家的社会调适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而这些国家为了回应现代化的挑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 274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 第 814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③ 汤因比认为“挑战—回应”模式有三种形态和结果 第一 当一个挑战太微弱时,则不会掀起什么回应。第二,当一个挑战太强烈时,则被挑战者将不能有成功的回应而趋于解体。第三,当一个挑战既不强烈,也不微弱时,则会导致一富有“创造性”的回应。第二种形态正是现代中国对西方的挑战的回应(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 83 页) 费正清用这一模式说明近代的中外关系,并得出中国对于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的结论。上述理论在受到柯文等人的批判后,现在已不再有了。实际上,费正清等人只看到中国内部存在的惰性,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现代性因素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参见[美]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战而进行的调适往往首先表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又从体制内和体制外对统治集团形成压力，迫使统治集团接受现代性，制定和实施现代化的政策。这种现代性意义上的调适，实际上是对传统性的扬弃。但是，现代性意义上的调适与传统社会的调适相比，具有异质性，它不是在传统架构内对传统的简单调整，而是对传统的创蚀和消解。传统社会的调适是对传统性的修补和加固，现代性意义上的调适则与之相反，它的前趋指向是实现现代化。但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处于边缘化半边缘化地位的国家，仅靠缓慢的、点滴的调适是摆脱不了危机的，这便有了更大力度的调适——改革（或曰维新、变法、新政）。改革是调适的一种高级的表现形态，或者说是调适的激烈表现手段。改革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大分化、矛盾的大碰撞、利益的大重组。改革成功，就可使国家化险为夷（如日本）；改革不力或者失败，则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革命便会到来（如中国）。^① 革命是对西方挑战的最激烈的回应，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对于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上层统治集团确实存在着“回应不力”的问题）。革命又源于现代性，而革命则使现代性获得了实现的前提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以革命的方式反帝反封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晚清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王朝。此前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调适、改革都是在传统性意义上进行的，其结果只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导演王朝更迭的活剧，社会的变动是六道轮回，社会结构更不可能出现现代性的分化。晚清王朝是传统性的延续，甚至是传统政治文化堆积得最为丰厚的历史阶段。同时，它又是与现代性遭遇的社会，是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的社会。由于传统文化发展的极致

参见拙文《论中国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性决定了晚清政府只能进行“有限的革新”^①。传统政治结构高度的稳定性和板结性，只有非常有限的容纳社会变革的能力与功能，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接近现代性的因素的发挥，也不利于经济组织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自发成长。^②由于现代性的扩张，决定了晚清政府不得不应付现代性的挑战，它的每一次调适和改革实际上又都是对传统的突破。现代化就是传统性衰败、现代性增长的过程。

殖民主义使近代中国逐渐边缘化半边缘化，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价值结构都遭到了消解。中国边缘化半边缘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殖民主义给晚清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殖民主义，而且也带来了现代性。由于晚清政府与殖民主义者在对中国进行统治中具有“同谋性”所以晚清政府对殖民主义者必然具有依附性，晚清政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现代性话语权。同时，殖民主义作为反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权，其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所导致的中国传统的衰败，并且“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③又导致了晚清政府对殖民主义的“怨恨”。对现代化的殖民主义的“怨恨”为现代性的不断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晚清政府对殖民主义的“依附性”和“怨恨性”，是它对现代性既排拒又接受的这一复杂心态生成的原因之一，而这又反映在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态上。由于晚清时期现代性的增长，导致了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化，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必然带来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在政治理念、利益追求、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晚清一元化的上层社会结构逐渐解体，政治功能逐渐衰败，而这恰恰成为晚清王朝覆灭的体制内的动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 275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二、晚清上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其他因素分析

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宗法一体化社会 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这种政治结构具有超常的“整协性”比贵族寡头政治更容易向现代科层制转变。但是，“正是中国政治理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完善性——不管它具体实现到何种不完善的程度——构成了它走向现代化的障碍”^①。从上层社会结构来看 尽管等级森严 但统治集团成员之间只是身份关系，而非契约关系；中国的城市只是一个行政实体而非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官僚体系缺乏现代的社会结构基础，官僚体制内部缺乏反对派即布尔乔亚集团以牵制政府。^②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对于这一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如社会地位上，从身份到契约（Status—Contract）；社会理念上，从神圣到世俗（Sacred—Secular）；社会关系上，从区社到社会（Community—Society）；社会组织上，从原级团体到次级团体（Primary—Secondary group）；社会价值上，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Particularism—Universalism）；社会评价上，从关系到成就（Ascription—Achievement）；社会功能上，从普化到专化（Diffuseness—Specificity）等等。^③ 这些“变项”渗透着现代性的张力 推动着晚清上层社会结构在动态中逐步开放。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 62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鲍达（D. Boddle）认为：“儒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统治团体 纵使没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与外在力量的制衡，仍然能够长久地忠于他的理想。在儒家的中国，那样的制衡是脆弱的，因为除了儒吏本身的阶级之外，社会上再无那种有影响力的团体的存在。中国没有类似西方所出现的都市布尔乔亚”。（转引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 53 页）

③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 64～65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晚清统治集团由于受到现代性的挑战，上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出现了不少新的社会阶层（social mobility）。下面我们着重分析具有特殊意义的四部分人：一是买办，他们是近代中国最先被卷入现代性潮流中的人；二是新式技术官僚，他们是封建官僚体制的依附者，也是晚清上层社会结构中最先出现的“另类人物”；三是绅士（或士绅）他们是上层建筑中的基层现代化的领袖人物，其中，一部分人已流转为上层社会的成员；四是新知识分子官僚，他们是晚清上层社会结构中最具有反叛精神的一个阶层。关于买办、绅士的身份问题，是一个不能化约的复杂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具有边缘化的色彩。我之所以把他们作为上层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是因为他们与政治权力之间具有“粘性”。只有与权力相结合才可能构成统治。买办通过市场经济、财产与上层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绅士在身份上原本就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近代的绅士又被涂上了现代性色彩，其中，一部分绅士通过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双向结合，已流转进了上层统治集团。所以，买办、绅士既是社会边缘人，又是上层社会中的一员。

在对上述阶层进行分析之前，我们还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满、汉官僚的特殊性。有清一代，满、汉矛盾一直很严重。到了晚清，这一矛盾更加尖锐。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虽然都是统治阶级，但在社会地位上双方并不平等，满族贵族比汉族地主的社会层阶高，同时，满族贵族把持中央，汉族地主则在地方拥有真正的统治权力（绅士只存在于汉族之中）。所以，满、汉矛盾实际上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即中央集权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斗争。这也反映出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日益受到挑战，现代性的地方自治理念正在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年前后，满人占京官的一半，各省总督的2/3、巡抚的

1/3。^① 由于汉族地方实力派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地方主义得到很大发展。到 19 世纪 60 年代，满人在地方的势力逐渐被汉人所取代。洋务运动时期是汉族地方主义急剧膨胀的时期。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流产后，地方主义一度受到抑制。但经过义和团运动，西太后最终确认了汉族官僚的实力，她不仅亲手扶起了被打倒的地方实力派，而且自己也走上了洋务之路。与此同时，地方独立意识迅速增长，这种独立意识既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反映，也是因为中央的改革滞后于地方，地方对于中央的离散情绪越来越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晚清的官场已是司空见惯。到 20 世纪初，“省”俨然成了独立王国，各省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财税、军事、外交体系。所有这一切，都在瓦解着帝国的统治，统一的君权日益失去其存在的现实性。以后，虽然出现了“皇族内阁”，但遭到各省立宪派的猛烈冲击，清王朝更加孤立。

第二，在研究现代性对于晚清上层社会结构影响时，必须考虑地缘学上的因素。比如说，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现代城市经济中心与传统城市政治中心对于现代性的接纳程度就不一样。一般说，沿海、城市特别是现代城市由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浓厚，外国入侵较深，因此接触现代性更早，现代性成分更多，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也更明显。柯文总结了沿海文化的五个现代性特征，包括西方的影响、商业的地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中西混合的行政司法、开放的目光等。^② 例如上海租界中“衡量身份的第一把尺度已由功名改为财产，官绅资格改为个人能力。一名善投机懂外语的买办，在租界统治者眼里的价值，远胜于曾戴花翎穿补服的失意官员。一名精于八股而略有

[美] 费正清、赖肖尔著 陈仲丹译：《中国传统与变革》第 324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② [美]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 143~144 页 中华书局，1989。

资产的贡士，在租界一般市民心中的地位，连瘪三出身的流氓小头目也不如^①。再如绍兴人特别注重在政府中的人事关系而不是才能，所以，“绍兴帮”上层社会结构的变迁实际上是人事关系的变迁；而安徽桐城上层社会人物绝大多数出自六大宗族，所以，该县上层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与土地占有情况、宗族组织关系密切相关的。

总体看，晚清官僚集团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还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尽管有一些具有现代性意识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但他们在现实政治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像魏源，就是这样的一位孤寂的“独行者”抑郁而终。但是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派、清议派、维新派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晚清上层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兹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分述如下：

1. 买办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自买办开始。买办原来只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但是，由于其丰厚的经济收入，特别是外国在华势力的保护，买办不仅仅扮演商人的角色了，他们很快就涉足到政治领域。他们不仅为外国商人服务，现代意识很浓，与外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权力相结合，而且与中国的上层社会权力相结合，有的本身就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据统计，1900 年前后在上海的 40 个著名的买办中至少有 15 个是候补道台。^②但是他们又是很著名的企业家，拥有雄厚的现代资本。相当多的买办身份十分复杂，有的人同时兼具多种角色。早期的买办，是中国最先尝试现代化的

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第 122 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美]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 148～149 页，中华书局 1989。

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第 105 页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人。由于他们拥有独特的优势，所以，他们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得最快。据统计，买办人数在 1854 年只有 250 人，1870 年为 700 人，到 1900 年猛增至 20000 人，买办的收入总数大约为 5.3 亿两（从 1842 年到 1894 年）^①，而同期（1894 年前）外国在华投资也仅有二三亿美元（甲午战争以后外国在华投资恶性膨胀）^②。另外，有的绅士和上层权贵也加入买办的行列，像两江总督沈葆楨的孙子沈昆山、禁烟督办柯逢时的儿子柯纪文、福建知事胡琢之的儿子胡二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乡友吴洞卿、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把兄弟王铭槐、翰林院编修江霞等都成了买办。^③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把买办看作为上层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至于 20 世纪以后，买办的政治地位更加提升，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在买办的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的特点。^④过去，我们对买办的理解，都是建立在政治意义上的，这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但是，这是不够的。应该说，买办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政治重于经济。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近代中国政治中的特殊群体，中外政治势力都不得不重视的政治力量。总体看，他们与外国在华势力、中国的上层统治者相互联合，三位一体，是“反现代”的现代性产物，是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力量。但是，从经济上看，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性意识，又不自觉地刺激了中国的现代化。买办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阶级，主要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一方面，单纯的商人，尽管拥有经济权力，但只能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不可

[美]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63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35 页，人民出版社，1956。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第 161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第 83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能进入政治的中心，只有将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社会话语权，同时，为经济支撑起保护伞；另一方面，经济不是政治的奴婢，更不是政治的妓女，经济只有独立于政治之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发展空间，商人一旦进入了官场，他在经济上的真正自由也就失去了，企业的现代性也就被损坏了，买办发展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轨迹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就是近代中国现代性内在的结构矛盾。但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上，买办阶级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政治自我否定并出现结构性腐烂的标志，同时，它使中国的上层社会结构朝着买办化的方向发展。但很多买办并没有固守传统，有的人像郑观应还极力倡导中国的制度变革，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当时影响很大，迄至今日，仍是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重要资料。

2. 新式技术官僚

中国的现代化滥觞于洋务运动，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开始于洋务运动。洋务派与买办相结合，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但是，这两个阶层的结合，也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打上了深刻的买办性烙印，而这两者后来在政治上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这种现代性的矛盾结构及其张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少有的复杂格局，也使近代中国上层社会阶层既具有多元化又具有边缘化的特征。

但是，洋务派倡导新学、培养新式人才特别是派遣留学生之举使传统的上层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同时随着洋务派的出现晚清上层社会结构中产生了依附于洋务派的专门办理洋务、与外国打交道的的新式技术官僚。这些人主要是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依附于传统的官僚体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权力机构供职，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手下充当幕僚，参与谈判、担任翻译或管理企业等等。新的权力机构和新的技术官僚的出现官职专门化、技术化，

使晚清政权朝着“形式理性”的方向前进了一步。^① 这些技术化的官僚，实际上具有多重身份，大致上既是官员，又是某一方面的技术专家。如西书翻译家、外交家、新式学堂的教师、政治家的幕僚、谋士、商人、企业家等等。其职业具有边缘化色彩，很难将他们归属于哪一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传统的官僚。

典型的人物如马建忠。出身江南商人家庭的马建忠，受过系统的传统儒家教育，有着扎实的经史知识功底，但他敏锐地感到西方的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从未有过的变局，所以，他弃科举，究西学。李鸿章资送他赴法留学，他也长期充当李鸿章的幕僚，办理洋务事业。他既抨击封建主义的闭关自守，也非议洋务派的垄断政策。像马建忠这样的一批新式技术官僚在当时虽然属于“另类人物”，但是，由于洋务派地方势力的膨胀，加上很多新式技术官僚自己也办企业，所以，作为一个新的官僚群体很快形成了。

这些新式技术官僚在晚清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权力部门都有比较高的地位，有的甚至占据着十分关键的位置。如同文馆的开设，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外交官。他们中有很多人担任大清的驻外使官、外交部高级官员。他们的加入，彻底地改变了清政府外交人才的结构，扭转了清政府外交依赖洋人的局面。再比如，首届留美学生回国后，担任铁路局长的 3 人，大学校长的 2 人，从事外交、行政者 24 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 12 人，外交次长、公使 2 人，外交总长 1 人，内阁总理 1 人，海军将领 14 人。而甲午战争前留学欧洲的学生，他们回国后，主要在海军部门工作。他们不

马 克 斯·韦伯否认中国存在形式理性，如他说：“中国缺乏像西方那样为合股经营的自由工商组织所规制的一套稳固的、被公开承认的、形式的、并且可以信赖的法律基础。正是这样的法律基础，助长了西方中世纪手工业里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中国的宗教》第 83～84 页）韦伯的这一观点显然是缺乏对近代中国的了解。

仅是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先驱者，而且在甲午海战中那种惊天动地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新式技术官僚分属各个洋务派集团，与洋务派联系密切而又不同于洋务派，或者说是洋务派集团中的激进派，他们在洋务派官僚的羽翼下得到发展，又站在洋务派的肩上，主张维新，是维新派的先驱人物。正是这批新式技术官僚的出现，才成为其后晚清上层社会结构产生嬗变的诱因；也正是这批新式技术官僚，扮演着向传统政治制度传输现代性信息的角色，牵引着晚清政府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同时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墓地。

开始出现于洋务运动前后的具有边缘化特点的新的技术官僚群体，在半个世纪中，特别是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发展很快。他们不仅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带来了中国上层社会结构的变动，而且是地方主义、维新主义的中坚分子，是清政府制度内革新的积极力量。不过，尽管他们是清政府中现代化的领导者、组织者，但由于“领导权依旧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养都更正统、更符合传统的人们的手中”^①，所以，新式技术官僚很难真正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且，由于他们是现政权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决定了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君主立宪是他们的心理祈求。

3. 绅士

绅士 (Gentry) 也叫士绅。在西方，绅士指的是身份、地位低于贵族的中上层。中国的绅士产生于封建社会，指地方上有身份、地位的人，是退休还乡的官员，也包含一部分士大夫（任官职的知识分子）。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将中国的绅士称为 Literati。他从中国的教育与政治权势关系的角度，认为绅士是中国有特权的

[美]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63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上层集团。实际上,Gentry 和 Literati 都不能确切地表达中国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阶层的属性。从阶层属性来看,中国的绅士是处于官之下、民之上的社会阶层。从社会功能来看,它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它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责包括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从意识形态的引导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以至于进入行政职责的范围^①。它尽管不再是官僚阶层,但是,它对于地方社会的治理、整合,却是各级手握权柄的官僚所难以做到的。如果没有它,政府将留下很多权力真空地带。可以说,绅士是无职之官、有权之士。

传统社会的绅士是介于上层与下层中间的社会阶层。到了近代,绅士阶层有了很大的变化,相当一部分人由中间阶层向上层流转。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传统性的自然流失,主要指封建官僚制度自身的腐烂。科举制度是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部分,国家主要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知识分子进入各级管理机构。“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把读书——做官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参政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反叛意识。但是,明清以后,科举制度弊窦丛生,投机钻营之人大肆行贿,贪官污吏大肆受贿,“在十九世纪初期这个制度已因种种腐败陋习搞得千疮百孔,考生雇用‘枪手’,老师冒充家仆,试官收受贿赂,不一而足”。光绪处于理想高尚而实行很鄙劣的矛盾状态中^②。封建政府由于财政羞涩,同时,也为了牵制“正途”绅士,便实行捐纳制,即用金钱买功名、官职。污水从封建官僚制度的源头(官员选拔)流进来,使上层政治体制自我瓦解。据统计,到19世纪90年代,绅士及其家庭成员达700万人以上,其中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2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一半是“异途”绅士，上层绅士占绅士总数的 14%，其中也有一半是“异途”出身。^①“19 世纪科举制度的衰落正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②“‘异途’绅士数量的增长不仅仅是改变了绅士阶层的构成，而且使得这一传统的社会阶层融入了‘经济’的力量。随着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经济的因素不仅启示着绅士阶层的发展趋向，而且也制约了清王朝统治者的意愿。它所形成的巨大的离心力，最终成为清王朝统治大厦迅速坍塌的社会因素之一。”^③

第二 现代性的增长 即帕雷托所说的“精英流转”。帕雷托认为，精英流转根源于社会的异质性，而社会的异质性又根源于个人的异质性。^④帕雷托将社会分层的原因归结为个人体格、道德、智能的差异，遮蔽了社会分层的真正始因。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流转，是现代性增长的结果。民族危机使绅士阶层首先感到的是“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身份危机”大大地增加了现代化的魅力。^⑤传统的绅士扮演着传统价值“守护神”的角色。到了近代，尽管他们仍然发挥着原有的功能，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另一种角色，即推进中国向现代转化。在他们的观念中，传统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传统的价值并不具有“神圣性”，因此，传统不应该是固态的。观念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绅士政治参与模式的变化。职业的多元化、身份的多元化是绅士阶层流转的最显著特征。近代的绅士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了。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 138～139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 9～10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 32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第 170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 284～28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绅士阶层在近代的流转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从职业上看，一是地方社会的基层管理者，这占大部分，他们仍然操着传统的职业；二是投资工商业，在经济上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三是从事各种现代性职业，如编辑、记者、律师等，在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解构着旧的体制；四是成为上层政权的官员，他们既是上层统治者，同时由于他们将现代性输入进官僚体制中去，所以，他们也是旧制度的瓦解者。第四种职业情况是作者讨论的对象。

从社会地位来看，社会地位与职业密不可分。一是传统的处于社会基层的绅士，他们在当地富有声望，与地方官府有联系，尽管他们处于基层，但对于封建帝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二是工商业资本家，他们的经济地位很高，同时由于他们与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的人亦官亦商，所以，这部分人也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经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领导者，他们是近代新的阶级——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之一。三是现代性职业者，他们在晚清社会中属于“另类人物”，处于现实政治权力的边缘，但他们拥有未来；四是新加入上层政权的绅士，他们在现实政治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同时由于他们对现代性的价值倾斜，使他们注定了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是主要角色的扮演者。据统计，清末咨议局议员中，绅士出身的议员占 90.9% 以上，各省议长 21 名，绅士出身者 20 名；1910 年清朝设立资政院，各省互选议员 98 人，其中属于功名出身的绅士分别为：①

进士	26 人	举人	37 人	贡生	18 人
生员	11 人	监生	1 人	其他	5 人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社会的绅士阶层只是在汉族范围内，因为满族没有绅士。满族是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且，在社会阶层的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 274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等级上，满族人要比汉族人高。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满族人基本上垄断了中央及地方的上层政权，汉族人主要在地方上参与政权，绅士则占有基层政治的发言权。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满、汉两族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汉族官僚权位不断上升。在这一权力大位移的过程中，绅士阶层的加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对权力的争夺，更主要的是对晚清上层社会结构的瓦解，是对神圣化的皇权的创蚀，使晚清政治逐步世俗化。

另外，近代中国绅士向上层社会流转，毕竟只是一小部分。而这部分又主要来自于开放程度比较高、现代性意识比较浓的地区，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城市；同时，能够上升到上层政治中的绅士，一般来说又是经济实力比较强或者有比较强硬的政治背景。但是，不管怎么说，绅士阶层的现代性流转，对于晚清政权结构的解体，都具有革命性意义。

4. 新知识分子官僚

新知识分子进入清政府上层权力圈，为晚清上层社会结构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新知识分子是教育现代化的产物。19 世纪 60 年代新式学堂的开办、70 年代留学生的派遣，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始。据有的学者研究，甲午战争前 33 年共办学堂 25 所，战后 5 年（1895 年至 1899 年）共办学堂 107 所。^①从 1872 年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到 1911 年，官派留学生共计 20000 多人，自费留学的人更多。这样，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不少学堂获得热心支持，为‘积极的新中央政府’培养‘新一代的’‘国家官吏’。”^②“新学校一般掌握在地方精英的手中，这些学校的课程鼓励非正统的观念；既然学校经常吸收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它们就

乐正：《从学堂看清末新学的兴起》，《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第 171 页，中华书局，1989。

〔美〕汪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第 150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